

清季武昌學界的革命運動*

蘇雲峯

前言

- 一、清季武昌新式學堂的設立
 - 二、學潮與革命運動之醞釀
 - 三、學界與早期革命組織之關係
 - 四、張之洞的疏導、控制與鎮壓
 - 五、學界與武昌首義
- 結論

前言

辛亥武昌起義，能够一舉成功，決不是一件偶然的事。

辛亥革命的成功，是革命黨人、會黨、與兩湖軍學界長期共同努力的結晶。

由于辛亥首義發生于武昌，「湖北人為首功」，^①本文就以武昌為中心，討論此一運動的背景；又武昌革命運動，發動於學界，完成於新軍，故學界實居於領導地位，值得注意。本文就以學界（包括軍事學堂）與革命運動的關係為範圍，而不涉及於新軍或其他史事的陳述。

一、清季武昌新式學堂的設立

湖北的新教育，在張之洞的苦心經營下，確有顯著的成就，在華中地區，首屈一指。他亦因此而被譽為「當今第一通曉學務之人」。^②

湖北的新教育，是由高等向低等發展的，而且自始就偏重於武昌一地，直至光

* 本文承蒙張玉法兄指正的地方很多，謹此表示謝意。

① 羅家倫編：《革命文獻》（民四六，臺北，中國國民黨黨史會），輯一，頁五。各省代表「慰勉武漢各界文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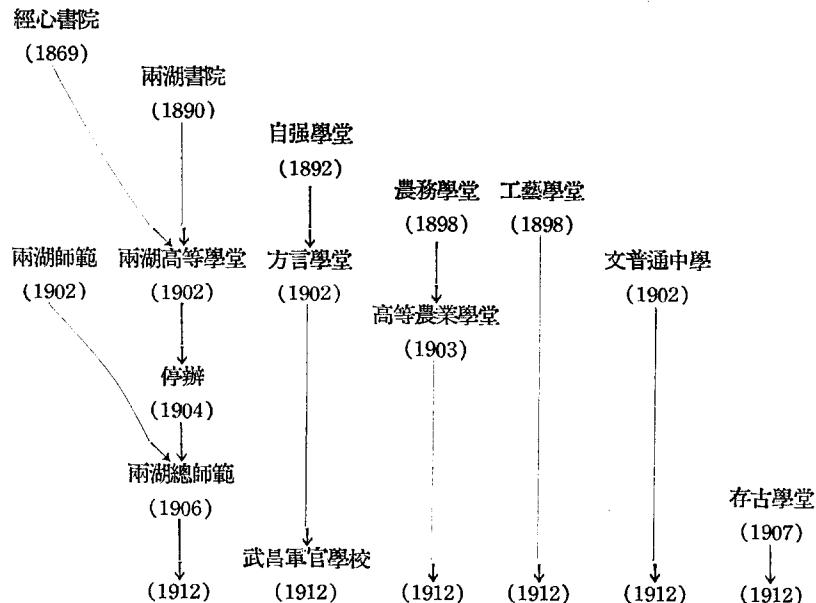
② 蔣良騏等編：《十二朝東華錄》（民五二，臺北，文海），光緒朝，頁五〇一八，張百熙等奏派張之洞會商京師大學堂章程摺，光緒廿九年閏五月十八日。

緒廿八年以後，才開始向各府州縣地方推廣，所以武昌成為當時中高級新知識份子會集的地方。估計于光緒廿八年時，約有中等以上文學堂學生一千五百餘人，武學堂學生五百餘人；光緒三十年底時，武漢地區有學生五千餘人，此外有留學生四百人；光緒三十三年，中上文學堂增至約四、五千人，而武學堂亦增至約一千七百餘人之多。^③

武昌著名的文學堂有：經心書院、兩湖書院、自強學堂、農務學堂、工藝學堂、文普通中學、兩湖總師範學堂與存古學堂。武學堂方面有：武備學堂、將弁學堂、陸軍（特別）小學堂、陸軍第三中學堂及測繪學堂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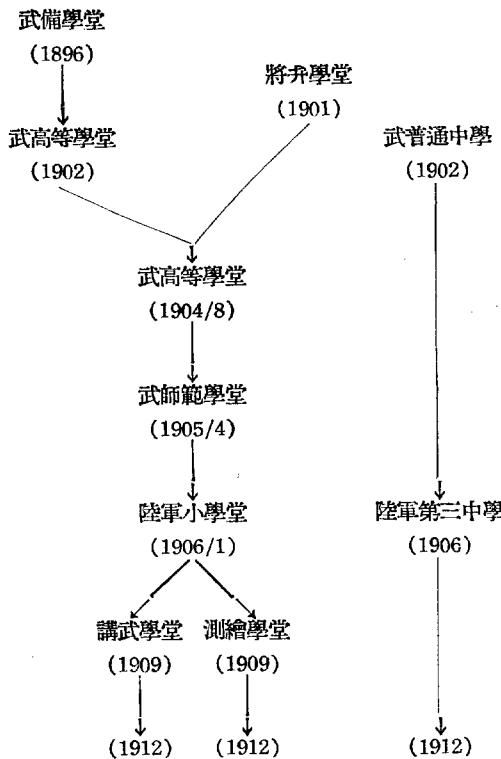
這些文武學堂，有的因時勢的需要而改變體制，或合併，或分設，名目頗多，不易明瞭。為此，特將各學堂建設時間及演變情形，分別製成二表，以助了解。

武昌文學堂之創設及演變系統表



^③ 光緒廿八年的數字，係據各學堂歷年招生的定額估計，實際人數可能要少一些。三十年的數字，係據張之洞所寫的「學堂狀」，五千餘人中，絕大部份在武昌，不過，這裏面亦包括一部份小學生。（張文襄公全集，冊三，頁一九三〇）。三十三年的文學堂數字，係據學部總務司編，光緒三十三年分第一次教育統計圖表（民六二，臺北，中國出版社），頁六三七~六四一。至武學堂的數字，係據各學堂定額估計。

武昌軍事學堂之創設及演變系統表



武昌的這些學堂，對革命運動發生了下列二種作用：（一）提供革命活動的舞臺，是革命的溫床，亦是革命思想的傳播站。（二）供應革命領導份子，使革命運動能够持續以底子成。尤以兩湖書院、武備學堂、文普通中學、總師範學堂、陸軍小學堂與測繪學堂最為顯著，值得簡單介紹。

（一）兩湖書院

兩湖書院，係張之洞設于光緒十六年，初以經、史、理學、詞章為課程，培養「出為名臣，處為名士」的人才，但因受甲午戰爭的刺激，與教習中維新份子如楊銳、汪康年、陳三立、周錫恩、易順鼎等人的影響，二百四十名學生中（湖南、湖北各一百，另商籍四十），出現了一些憂時愛國的志士，如唐才常、程家樞、傅慈祥等是。唐才常于光緒廿一年五月八日函告他的父親說：「院中諸友，亦有可互相砥礪之處，則今日之所為翱翔鄂渚，不適志者，安知非天之玉成也。」^④他于廿三年到湖南參加了那裏的新政運動。而程家樞，因在院內與同舍同學講漢滿種族

^④ 湖南歷史資料（一九五八，湖南），期三，頁八七～八八。

差別，為監督梁鼎芬所忌，憤而赴日留學，求見革命領袖孫中山。⑤ 傅慈祥則投筆從戎，于廿二年考入武備學堂，與吳祿貞同學。

兩湖書院，于光緒廿二年，改照學堂辦法，廢除理學與文學，增加輿地與時務，改月課為日課制，每天上課二小時。稍後，又增開許多應用科學課程，如天文、地圖、兵法、體操等。迄廿八年，改為兩湖高等學堂，分為經學、中外史學、中外地理、算學、理化學、法律學、財政學、與兵事學八門，請中外專門教習擔任課務。⑥ 兩湖書院，由此而一躍為包括文、理、法三科的高等學堂。

不過，學生則由原來的二百四十名，減為一百二十名，先以原來就讀于兩湖、經心、江漢三書院的高等生入堂肄業，補普通學一年，再習專門三年畢業。

在這一段時期內，由於受湖南維新運動與戊戌政變的影響，張之洞對學生的思想加強控制，不過，師長中，頗有開明之士，如監督蒯光典、王同愈、黃紹箕，教習姚晉沂、沈曾植、鄒代鈞等，對學生多少有所影響。學生中，同情及參加革命的人比以前更多，著名的如黃興、時功玖、曹亞伯、賀子(之)才、胡秉柯、但懋、李步青等人。可能于改為兩湖高等學堂後，參加革命活動的人太多，張之洞與端方等人無法對付，除將部份激烈的派赴歐洲留學外，于光緒三十年將之停辦。

(二) 文普通中學堂

文普通中學，是張之洞于光緒廿八年建立湖北學制體系時，才設立的一所學堂，招收學生二百四十名，年齡限定于十五歲至廿四歲之間，四年畢業。所教為普通科學課程，如倫理、溫經、中文、外國語文、歷史、地理、數學、博物、理化、法制、圖畫、體操等。⑦ 文普通學生中，參加革命活動的很多，當光緒三十年五月，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成立時，此學堂中就有學生四十餘人加入為會員，著名者有宋教仁、歐陽瑞麟、田桐、蔣作賓等人。

⑤ 程家璧，字韻蓀，安徽休寧人，曾參加唐才常返國前的策劃。廿九年返鄂活動，梁鼎芬聞知，懸賞捕拿，離鄂赴日，參加同盟會的籌備工作。見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：《革命人物誌》，集六，頁二〇七~二二〇，宋教仁撰，「程家璧」。

⑥ 張之洞：《張文襄公全集》（下簡稱張集）（民五二，臺北，文海），冊二，頁一〇一四，「籌定學堂規模次第興辦摺」，光緒廿八年十月一日。

⑦ 同上，頁一〇一二。

(三) 總師範學堂

總師範學堂，設于光緒二十八年，招生一二〇人，原稱兩湖師範。三十二年春，改稱兩湖總師範學堂，招生四八〇人，目的在培養師資。但由于有些革命教師活動其間，學生深受影響，如教育學教員金華祝與余德元，于光緒廿九年春自日返鄂後，就參加了李步青等人的秘密活動。教員時象晉（時功玖之父），在講課時，「每痛陳滿洲專制，外人欺侮狀」，使學生意憤不已，而有革命之思。^⑧另一位教員郭肇明（後出任堂長），亦與時象晉一起活動。甚至堂長胡鈞（原兩湖書院畢業留日二次），亦參加了同盟會。^⑨此外，同情革命的教員尚有張繼煦與周龍驥，一教歷史，一教地理。所以前有學生李作棟、蔡大輔、宛思演等十五人參加日知會，後有張振武、蘇成章、邢伯謙、袁國紀、周之瀚、牟鴻勳等人參加共進會，投身于辛亥首義的行列之中。

(四) 武備學堂

武備學堂，設于光緒二十二年，是張之洞準備訓練新軍的第一個重要建樹，請德國軍官三人為教習。由于時局的刺激與張之洞的鼓勵，投考的文武舉貢生員有四千人之多，非常踴躍。考試後，錄取一百二十名。吳祿貞、藍天蔚、及兩湖書院的傅慈祥、劉邦驥等，均為其中之一。不過，因德國教習想攬兵權，為張之洞所反對，而不甚合作。所以，最初辦得不很順利，而學生于廿四年，亦曾發生集衆逞凶事件，使張氏痛心不已。不過，它確實培養了許多軍事幹部，除分派赴京師、各省及鄂新軍服務者外，先後還選派近百人赴日學軍事，^⑩可謂盛極一時。武備學堂諸

⑧ 中國國民黨黨史料編委會：《革命人物誌》（民五八，臺北，該會），集四，頁三七二，仇亮撰，「孫振武」。

⑨ 張難先撰，湖北革命知之錄（下簡稱知之錄）（民三十五，上海商務），頁一〇五；頁一八四～一八八。

⑩ 據房兆楹，清末民初洋學學生題名錄初輯（下簡稱題名錄）（民五一，南港，中研院近史所），頁四五～五一。及黃福慶撰「清末的留日政策」（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，期二，頁五九）。統計湖北官派留日學軍事的人數如下，其中多數為武備學堂學生：

年份	人數
光緒 24 年	24
光緒 25 年	19
光緒 28 年	8
光緒 29 年	49
合計	100

生中，參加革命的除上述吳、藍、傅三人外，尚有孫武、何季達、鈕永建、李四光（仲達）等人。

光緒廿八年，改爲武高等，三十年七月合併將弁學堂，仍用舊名，翌年二月改爲武師範學堂，一年後又改爲陸軍小學堂，培養下級幹部。革命黨人藍天蔚可能自武高等起就在這裏任教。

（五）陸軍小學與測繪學堂

陸軍小學堂，是張之洞于光緒三十二年一月設立的。依照中央練兵處的規定，每年只准招生一百，三年畢業。學生以年在十五至十八歲之「良家官商子弟」爲限。^⑪但張之洞沒有依照此項規定辦理。他認爲中國必須精練陸軍百萬，大省最少五六萬，中小省亦非三萬人不可。爲適應此需要，必須大量培養下級幹部。^⑫于是，他將名額擴大爲三千，計劃每年收一千（實際每年約三百人），一律按日到堂上課。學生報考資格，亦改從湖北陸軍士兵中挑選文理通順、身體健全者，入學受訓，因爲「良家官商子弟」，不能吃苦耐勞。^⑬

陸小的課程，是普通科學、軍事科學與體能訓練並重。

陸小的總辦是張彪，會辦是黎元洪，監督爲劉邦驥（與吳祿貞同時留日），提調爲白壽銘（將弁學堂畢業）。教官中，除少數日、德二國人外，大半爲中國留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，及將弁學堂的學生。^⑭

湖北陸小，可能由於不合中央規制，亦可能因受革命黨滲透嚴重，于三十四年五月被清廷強令停辦，而將原址改爲講武學堂及陸軍測繪學堂。^⑮

在停辦以前，陸小的控制權雖轉移到滿人手裏，但學生一百二十人中，漢生佔一百，滿生僅二十人，由於滿漢學生間的待遇不平，引起漢生的憤恨不滿，成爲革命思想滲透的良好條件。有的秘密傳閱革命刊物，有的甚至公然抗拒命令，^⑯而畢

⑪ 東方雜誌第二年，期四、六，「陸軍小學堂章程」。

⑫ 張集，冊二，頁一二三七，「籌辦陸軍小學變通部章摺」，光緒卅三年七月廿八日。

⑬ 同上。

⑭ 同上。

⑮ 辛亥首義回憶（一九五七，湖北），輯二，頁四三。

⑯ 萬耀煌「辛亥之回憶」，中華雜誌卷1，期3（民國五十二年十月十六日），頁九。

業後服務于新軍中的一千五六百人，復因升遷困難而紛紛參加革命組織，著名的如熊十力、趙鵬飛、王鴻猷、蔡濟民等。^⑪

湖北陸軍測繪學堂，如前所說，是于宣統元年冬，利用部份陸小原址而設的，時原附設于陸小的測繪班已畢業兩屆，共一百十人。其中有五十三人因尚未派遣工作，全數撥入測繪學堂繼續學習。^⑫ 同時另招新生一百名，共一百五十三人。

測繪學堂初時的總辦為劉邦驥，後來改由喜源（滿人）* 與白壽銘主持，學生們參加革命的情形，尤其活躍。辛亥武昌起義那一天，他們一百五十三人中，有八十一人拿起武器，響應革命。^⑬ 有人認為，他們的響應，是革命一舉成功的主要力量之一。

二、學潮與革命運動之醞釀

湖北學堂的個別學潮，發生于光緒廿三、四年初，似無顯明的政治意義，但自光緒廿六年起，因受到留日返鄂學生的影響，而逐漸形成一種政治性的革命運動，迄光緒三十二年正月，與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勢力合流，而愈見堅強，奠定武昌首義的基礎。

光緒廿三、四年間，正當湖北災荒，飢民百萬，會黨四出騷擾，教案不斷發生，而湖南及北京等地又發生激烈的「新」「舊」思想衝突的時候，湖北的自強學堂與武備學堂，亦連續發生學潮。自強學堂方面，是學生劉問堯、管存元等「酗酒滋事，糾衆毀閭」；在武備學堂，則有學生張英「糾衆逞凶」。而這種「不守禮教，不求實學」的舉動，「一年有餘，積習未改」，^⑭ 可見學生情緒相當不安。苟不論這二個事件的真相如何，其共同表現，則是「糾衆」毀閭與逞凶，所以是許多學生的行動，而非一二人的犯規行為。其目的無論是針對學堂內部事務，或對國事

^⑪ 知之錄，頁八〇，一八三。Joseph W. Esherick; Reform, Revolution and Reaction;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peh (Ph. D. Dissertation), p. 286-290. 據調查，千餘人中，于辛亥前升為官佐者僅百人而已。

^⑫ 辛亥首義回憶，輯二，頁四三。

* 按喜源為江南高小畢業生，光緒三十四年二月（二十二歲）入兩江師範公共科，宣統元年六月畢業，二年到武昌任高等農業學堂監督。他以二十五歲的青年出任總辦，未免會增加漢生反滿的情緒。

^⑬ 同上。

^⑭ 張集，冊三，頁一八六二，「札委正途出身各員充武備自強學堂敎習」，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十八日。

而發，均同樣代表不滿現狀的情緒。這種反抗權威的情緒，當受到外來革命份子的利用與組織時，就變成政治性的學生運動了。

最早進入漢口的外來革命份子，可能是興中會會員容星橋。他是廣東香山人，在漢口一俄國商行當買辦，曾于庚子春接應孫中山從東京介紹來的自立會黨人林圭（湖南時務學堂學生）。^{②1}不過，他可能沒有發展組織，頂多是聯絡會黨而已，與學界恐無任何關係。

最早在日本認識孫中山而傾向革命的湖北學生，可能是兩湖書院的劉成禹、戢翼翹、程家樞三人。他們于二十二年留日，廿三年與孫中山往來。^{②2}次為武備學堂的傅慈祥與吳祿貞。他們于光緒廿四年十一月抵東京留學，可能約于光緒廿五年春夏間，由劉成禹介紹拜謁孫中山，而同情革命，加入興中會。稍晚是唐才常，由畢永年介紹，時于光緒廿五年十月前。^{②3}

庚子春，唐才常、傅慈祥、林圭等抵漢口，組自立軍，聚會黨十餘萬人，謀起事。傅慈祥並乘機聯絡武備學堂同學鈕永建、孫武（時任岳州武威營大隊長）、沈翔雲、艾忠琦等數十人，以謀策應。^{②4}而時在兩湖書院的黃興，亦曾秘密參與其事。^{②5}

與此同時（庚子春），另有四位可疑的「革命份子」，進入湖北農務學堂。他們是唐寶鍔、汪有齡、金棠、徐傳篤四人。唐是廣東香山人，光緒廿二年與戢翼翹等十三人同時留日，廿五年在長崎領事館工作。其餘三人，則為使館學生。他們是應張之洞的聘請，到農務學堂當日語翻譯的。他們是否為興中會會員，無法知道，但顯然被學堂監督羅振玉等懷疑為革命黨。羅形容汪有齡等三人「舉止浮滑」，唐

②1 田原賴次郎等編：《清末民初中國官紳人名錄》（一九一八，東京，中國研究會），頁三七二。容氏後赴英學海軍，辛亥後任廣東都督府交通部副部長。

②2 李廉方，辛亥武昌首義記（民五十，臺北，中國國民黨黨史會，影印本），頁三；革命人物誌，集六，頁二〇七，宋教仁撰，「程家樞」；及湖北文獻，期十五（民五九年三月十日，臺北，湖北文獻編委會），頁八二，邵百昌，「張文襄公在鄂作育人才及其影響」。

②3 知之錄，頁一九；馮自由，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（民四三，臺北，世界書局），冊一，頁六五～六九。

②4 知之錄，頁三二。

②5 李雲漢，黃克強先生年譜（民六二，臺北，中央文物供應社），頁三二。黃興原肄業湖南嶽麓書院，光緒廿四年與周震鱗、陳嘉曾、王達四人，同時進入兩湖書院；黃于廿八年畢業，考取湖北留日官費，赴日學師範（如上書，頁二八、三七）。

寶鍔「性尤陰鷙」，而說他們「半數為革命黨員」。羅的證據有二：（一）他們為了鞏固其地位，以掩護其工作，曾賄賂學堂提調，刪除第一年的日語課程，使學生非永遠依賴翻譯不可。（二）他們在學堂裏有秘密活動，吸收學生。以致前任監督認為全堂學生七十餘人「皆敗類，不可造就」，而主張「以快刀斬亂麻手段，亟停此校」。張之洞不同意停辦，特請羅振玉來整頓。羅氏仔細觀察後，發現譯員與學生之間，確有秘密的往來，於是，記過處分若干人。但最後仍發現五人「舉止詭異，與譯員過往甚密」，而勒令退學。^{②6} 這五位學生中，至少可以確定有一位是曹亞伯。曹是在光緒二十四年八月至次年正月之間，考入農務學堂的。他是蠶桑科的領班生，自稱在進入農務學堂以前，因讀了「格物探源」一書，而入大冶縣福音堂為信徒後，「家庭革命、社會革命之思想，日往復于胸中，不顧自身之一切，時與舊習慣相抗」。他係于光緒廿六年冬，離開農務學堂，考入兩湖書院。^{②7} 革命的一個火種，于是進入原已不安的兩湖書院。

庚子七月，兩湖學生唐才常、傅慈祥等二十餘人^{②8} 被害的消息，震撼武昌各學堂。學生自此才普遍知道「有革命之說」。由於八國聯軍佔北京，慈禧逃西安，人心益浮動，知清廷無能，而多不直張之洞所為。武備學堂學生沈翔雲（字虬齋），首先退學赴日，參加革命。^{②9} 而曾與唐才常接觸過的武備學堂學生艾忠琦等，都急於進入新軍，掌握兵權。

這年秋天，艾忠琦（後任三十四標統帶，駐兩江）與楊開甲（辛亥年任三十標標統，起義後，任都督府參謀部副部長）、熊鍾清、李文升、劉恕、劉葆青、陳鍾麟、葉文華等九人，要求張之洞派赴營隊練習，理由非常動聽，他們說：

方今時勢艱危，生等悲憤迫切，思圖報効，若蒙念其愚誠，令側軍中，歷習戎

^{②6} 羅振玉，貞松老人遺稿（民三十，北平燕京大學），甲集，冊六，頁一二。

^{②7} 曹亞伯，武昌革命真史，前編，自敍，頁一。

^{②8} 在自立軍之後已知殉難的七十人中，兩湖五八人，他省八人，不知省籍者四人。主要為知識份子與秘密會社人物。在已知背景的六四人中，秘密會社領袖二二人，軍人五人，留日學生一五人，學生八人，教習三人，官紳一一人。其中以張之洞派赴日本留學的六人與時務學堂的六人為主要人物（見 Joseph W. Esherick, Reform, Revolution and Reaction, p. 27）

^{②9} 革命文獻，輯二，頁一一二，朱和中，「歐洲同盟會紀實」。

事，雖極艱險，所不敢辭。³⁰

張之洞接受他們的請求，于十月派赴護軍營，隨軍練習。

同時，兩湖書院學生，于庚子九月廿二日，因聞東三省偏插俄旗，集議要求宣戰，公推時功玖起草宣言，情緒非常激憤。但由于張之洞的隱瞞真相，與監督王同愈的應付得當，沒有鬧開來。³¹這年冬天，曹亞伯入院後，與南齋的黃興、王文豹（後任北京政府司法部次長，代理部長）、王愷憲、周震鱗（後任南京最高法院院長，國民政府委員）等過從甚密，³²顯然已形成一個小革命團體。黃興不露聲色，埋頭苦練軍事技術，誓志革命，嘗作筆銘：「朝作書，暮作書，雕蟲篆刻胡爲乎？投筆方爲大丈夫」；³³而曹亞伯則大膽批評熱中利祿的同學爲「無骨氣」、「走狗奴才」，因此被一些同學視爲「瘋子」。³⁴廿八年春，輿地教習鄒代鈞令曹亞伯、王文豹二人赴湖南新化辦中學。曹教博物、數學及體操，採用隨機教學的方法，將革命排滿的思想編在教材之中，「而新化學界革命之思潮，幾不可遏止」³⁵。爲此，被張之洞斥爲「宗旨悖謬」。³⁶

自強學堂的情形亦不好，繼張英「糾衆逞凶」之後，又于光緒廿七年七月，有學生公然抗拒張之洞所派教習，並將牌示毀棄。事態之嚴重，從他的批示中可以看到一斑，他說：

此次所派各教習，乃本部堂向兩湖書院選取品學兼優之高等生，無非爲成就該堂學生學業之厚意。今自強學堂學生，輒敢不服本部堂所派教習，竟將牌示挖毀棄置，實堪駭異。本部堂建立學堂，籌款章程，不知費幾許心力，乃各生鑿次滋事，有負培植之心。……充此舉動，實開犯上作亂之漸。³⁷

這種行動，除了表示抗拒張之洞的命令外，還表示各學堂學生間的矛盾與不協，正

³⁰ 張集，冊三，頁一八九六，「札武備學堂派學生隨營練習」，光緒二十六年十月九日。

³¹ 張知本「武昌首義成功之因素」，中華雜誌卷一期三（民國五十二年十月十六日），頁六。

³² 武昌革命真史，前編自敍，頁一~六；李雲漢，黃克強先生年譜，頁二十八。

³³ 黃克強先生年譜，頁三十。

³⁴ 知之錄，頁六五。

³⁵ 武昌革命真史，前編自敍，頁二。

³⁶ 同上書，頁一二八。

³⁷ 張集，冊四，頁二一八一，「批自強學堂詳學生滋事各節」，光緒廿七年七月九日。

如兩湖書院學生看不起武備學堂出身的體操教習一樣。不過，學堂間的矛盾，因發現共同目標而逐漸消失，而不滿與反抗的情緒，則有轉化為革命的傾向。聯合的地點，先在東京，後在武昌。

促成湖北各校學生聯合的人，可能是兩湖書院的劉成禹。他時在日本成城學校學軍事。光緒廿八年五月，兩湖經心學生黃興等三十一人抵日學師範，劉以老同學關係，每逢假日，必來晤談。因此，很多人受其影響而傾向于孫中山。又由于身居異國，對同鄉與國家的認同比較強烈，彼此間的距離自然縮小。廿八年秋，這批師範生就跟他校的專科生與陸軍生，共同創辦「湖北學生界月刊」，標明欲「以世界知識及民族主義，喚起內地學生覺醒」。^{*}聯合的工作，於是形成。

他們于辦理「湖北學生界」之外，又創設昌明公司，作為接待湖北留學生，運銷書報，密送革命刊物與傳遞國內外消息的機關，以兩湖書院的萬聲揚為總經理，主持其事。^{**}

湖北學生在東京的言論及參加抗俄「學生軍」的愛國行動，對武昌學界已發生深刻的影響。他們的回國，自然會更進一步刺激學生的革命思想，而消除各學堂間的隔閡與不協。

李步青（廉方）、李書城、張繼煦、余德元、金華祝、周龍驤等人，相繼在廿九年春夏間返國，分別在武昌各學堂任教。^⑩而吳祿貞似亦在這一年返鄂，受到當局的重用，一身兼學務處會辦、營務處幫辦、將弁學堂護軍全軍總教習、武普通中學堂會辦等要職。^⑪革命份子散布在武昌文武各學堂的形勢至此已經完成。

在武昌的，就以李步青的花園山住宅為中心，邀集各校愛國師生，如兩湖文高等的胡秉柯、時功玖、賀子才、李藩昌、王鴻猷（後任南京臨時政府財政部次長）、史青、魏宸組（後任南京臨時政府外交部次長），武備學堂的朱和中、武高等的

* 李廉方，辛亥武昌首義記，頁二一三。

** 同上，頁三。

⑩ 房兆麟，清末民初洋學學生題名錄初輯，頁二五～二七；知之錄，頁四三。

⑪ 關於吳祿貞回國的日期，有兩種說法：中央黨史會編吳祿貞傳（在湖北革命知之錄，頁二九）作光緒廿七年；而朱炎佳的「吳祿貞與中國革命」（在中國現代史叢刊，冊六，頁一六六），則作光緒廿九年。本文採用後說，但因張之洞二十九年在北京，故安排吳祿貞工作的恐係署督端方，而非張之洞。

呂大森，自強學堂的馮一，文普通的時功璧，師範教員時象晉、郭肇明，工藝學堂教習范鴻泰（留日工科生），與屈德澤（留日農科生）等二十餘人，經常秘密集會，討論革命方略。^⑩ 目的在運動學生與新軍。吳祿貞亦常到李宅與同志縱談，又利用其地位，安置同志于軍學界中。^⑪ 黃興于閏五月末返湘路過武昌，亦居李步青處，「日日宣傳革命，嘗至兩湖書院演說漢滿畛域，嚴責清廷顛頽無能，主張推翻滿清專制政體，收回漢人主權。」為署督端方所悉，令梁鼎芬捕拿。梁愛其才，懸示驅逐出境。黃興從容不迫，留鄂八日，迄將所帶「革命軍」（光緒二十九年五月，上海）等書四千餘本分送軍學界後，始登輪返湘，出任長沙明德學堂教務長。^⑫ 程家樞亦到鄂活動。因被梁鼎芬「懸賞捕之」，而離鄂赴日。

有一位名叫黃公徵的人，因受學生影響，願以金錢幫助革命，在水陸街設一會所，叫「武庫」，每月約同志集會數次，參加者有劉靜安、李亞東、馮一、范騰霄等人。

他們對外的宣傳活動很積極，方法亦很進步。除書刊與演講外，還採用幻燈機。機由時功璧操作，耿觀文（文高學生）說明，「凡片中涉及世界民族運動與被壓迫情事，必盡量發揮」。負責演講者有吳祿貞、劉伯剛、金華祝、余德元等人。由於採用這種新穎的方法，觀眾思想，深受影響。※

在這批返國學生的鼓勵下，武昌學生數百人，曾于是在夏天響應東京、上海學生反對中俄密約的行動。他們在武高等學堂呂大森，兩湖書院時功璧、曹亞伯等的領導下，浩浩蕩蕩，到曾公祠集會，直斥清政府昏庸無能，喪權辱國。^⑬ 這是湖北

⑩ 知之錄，頁四三；武昌革命真史，前編頁一二七。關於范鴻泰與屈德澤的背景，見房兆楹的題名錄，頁二、四。

⑪ 李廉方，辛亥武昌首義記，頁二。

⑫ 李雲漢，黃克強先生年譜，頁五八。據李書，黃興當時還散發「猛回頭」一書。此說，本文沒有採用，因「猛回頭」於黃興返國後才在東京出版，時間為光緒三十年。（見張玉法編晚清革命文學，民六一，臺北，新知雜誌社，頁一四一）。張之洞于三十年十一月初查禁此書（張集，冊三，頁一九二八）。

※ 李廉方，辛亥武昌首義記，頁三～四。

⑬ 知之錄，頁五五。對這次集會，亦有批評其不够真誠者。批評的話，來自朱蘭陔。他說，于集會前夕，「兩湖書院倅來相邀，共同起草，情緒熱烈，但翌日集會時，竟有學生「乘是日停課以觀劇者」，甚至「有朝登演說壇，夕作狎邪遊者」。因此，使他感到很灰心。見湖北學生界（漢聲）第七八期，頁二一一～二一六，「荊州同鄉追悼朱君蘭陔文」。他的話可能是事實，但他未免悲觀，只看到此運動的弱點。其實，他自己就沒有去參加集會，同學早晨尋他不着，迄中午才見他「垂首怏怏自外歸」，發此牢騷。

從來最大的學生政治性集會。署督端方以彼等在鄂，將惹更多麻煩，乃於是年（二十九）秋，擇其激烈之賀子才、喻毓西、李仁炳、魏宸組、胡錚（再度留學）、周澤春、朱和中、祝乾達、王鴻猷、左德新、錢祖元、史青、劉蔭茀、胡秉柯、李藩昌、陳寬沅、程光鑑、潘祖瑞十八人赴歐洲學工程與法律，^⑬另五十人赴日本學軍事，^⑭以殺其勢。他們多為兩湖高等學堂及武備學堂的學生。

可是，賀子才等抵歐後，行動更加激烈。他們一羣十八人，于光緒三十一年春天，迎接孫中山于北京，相聚討論三日，一起宣誓加盟，^⑮成為正式的革命黨員。

在長沙方面，黃興就以明德學堂為中心，展開革命宣傳與組織活動。光緒廿九年九月十六日，他與周震鱗、宋教仁、吳祿貞（應黃之請）、陳天華等廿餘人，成立湖南第一個革命組織華興會。稍後，李書城、李步青、金華祝亦到長沙，或在明德教書，或助辦速成武備學堂。曹亞伯則在湘鄂之間走動，聯絡策劃。^⑯

黃興的華興會，對湖北的革命團體，具有直接催生的作用。

三、學界與早期革命組織之關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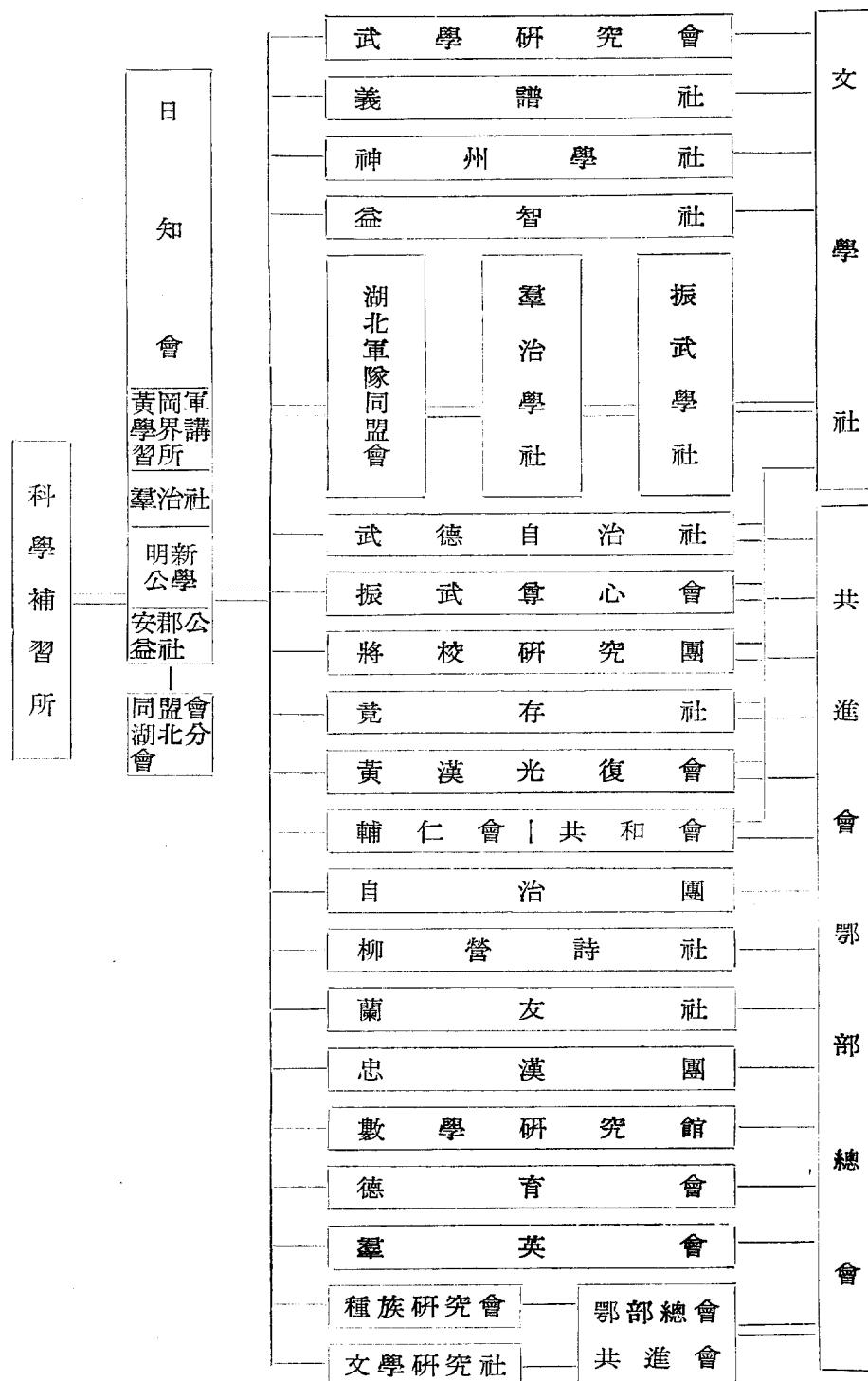
激烈學生之被遣離鄂，不但沒有削弱學生的革命火勢，反而加速擴及軍隊，並由言論宣傳，進入革命行動的組織階段。在黃興、宋教仁、曹亞伯、呂大森、吳祿貞、藍天蔚、孫武等人的策動下，自光緒三十年起，湖北先後成立科學補習所、日知會、同盟會湖北分會、黃岡軍學界講習社、湖北軍界同盟會、羣治學社、振武學社、文學社與共進會等卅一個革命團體。其演變如下表：

⑬ 知之錄，頁一〇三；至學生名單、出生年月及攻習科目見革命文獻，輯二，頁七六～七七。

⑭ 黃福慶，「清末的留日政策」，（近代史研究所集刊，期二，頁五九），引日本外務省藏：「在本邦清國留學生關係雜件～陸軍學生之部」，據此項資料，端方是于廿九年十二月派這批學生出國的。

⑮ 知之錄，頁一〇三～四；革命文獻，輯二，頁七六～七七。

⑯ 黃克強先生年譜，頁二九、六二、六八～七〇。



(本表採自李時岳，辛亥革命時期兩湖地區的革命運動，頁五九)。

從科學補習所至同盟會與日知會，學界是為主要骨幹，參加的學生人數很多。自日知會被查封後，學界的活動受到相當限制，不能展開。可是，由於張之洞主張文武合一教育，鼓勵知識份子入新軍當兵，革命運動，遂由軍界接棒，而轉為主流。從湖北軍隊同盟會至文學社，幾乎完全是新軍士兵的革命組織。迄共進會成立後，才恢復學界的活動。

以下，就依時序介紹武昌學界與科學補習所、同盟會、日知會與共進會四革命團體的關係，及其所扮演的角色。

(一) 學界與科學補習所之設立

科學補習所於光緒三十年五月正式成立，它是湖北的第一個革命團體，亦是華興會的姊妹組織。

科學補習所的發起人，是劉靜安、呂大森、曹亞伯、宋教仁與張難先、胡瑛等人。目的在向軍學界散佈革命書刊，宣傳革命排滿思想，介紹會黨及知識份子進入新軍，以伺機響應革命。這是軍學界革命青年的聯合陣線，而學界青年，尤其扮演重要的角色。他們的地位，從該所組織名單中，可以看到：

所長：呂大森（字槐庭，湖北建始人），武高等學堂肄業。如前所述，于光緒二十九年夏，曾招集學生數百人于曾公祠，反對中俄密約。他登臺演講，「斥政府失策，激昂慷慨，轟動一時」。科學補習所成立，他手擬章程，主持會務。^{④7}

總幹事：胡瑛（字經武，浙江紹興人），隨父（知縣候補）居湖南，是黃興在長沙經正（或明德）學堂的學生，在湖南時已矢志革命，因暗殺劣紳未成而被開除。于廿九年冬，由黃興、曹亞伯二人介紹到武昌吳祿貞處避難，不久識張難先等，同入工程營，負責購運軍械的工作。^{④8}

宣傳：曹亞伯（字慶雲，武昌興國州人），他在農務學堂與兩湖書院的情形，已如前述。除宣傳工作外，與時功璧、黃興等人統籌運用經費。光緒三十年九月，黃

④7 知之錄，頁五八，「呂君槐庭傳」。科學補習所被封後，他逃匿施南深山之中，迄辛亥首義後始出。

④8 知之錄，頁六二，「胡瑛傳」；武昌革命真史，前編自敍，頁二。

興等謀在湖南起事時，他至長沙協助。事敗後，帶黃興到長沙聖公會避難，得以脫險。^④

財政：時功璧，文普通學生（其父爲時象晉、兄時功玖）。

文書：宋教仁，字遜初，湖南桃源人。光緒二十八年（時二十二歲）入文普通中學，抱改革大志。廿九年于武昌聽黃興演講而矢志革命，是華興會的發起人之一，同時是本組織的策動人。

庶務：康建唐（恩施人），文普通中學堂學生，庶務外，負責運動會黨。

幹事：歐陽瑞麟（字季香，泗陽人），文普通中學堂學生，在校設大同書社，搜集新書，宣傳革命，曾在學堂中散發同學蔡達生以鐵漢筆名所寫的「死法」（東京，光緒三十年出版）數百本。時文普通有學生二百數十人，在他的運動之下，加入科學補習所爲會員者四十餘人，爲各學堂中參加人數最多的一所學校。^⑤ 事敗後助宋教仁脫險。

科學補習所成立後，在很短時間內，吸收會員數十人，顯然以各學堂學生爲主要對象。除上述諸人外，武備學堂有孫武，文高等有戴琫章，武高等有劉度成，將弁學堂有季雨霖，文普通中學有田桐、歐陽振聲、龔國煌、劉復、盧啓賢、曾松喬、陳文生（深）、曹德銘、羅律（立）中、汪育松、胡勘臣、胡靜軒、廖鏡泉等四十餘人。武普通中學有陳應甲（代表），自強學堂有馮一，及其他學生余誠等人。^⑥

科學補習所存在僅五個月，數月中，主要的行動有三：一在六月間在多寶寺時象晉住所開會歡迎黃興。會中，黃告以計劃于十月十日在湖南起事，與會會員一致贊同，準備響應。一在八月間，在新址魏家巷一號開大會，討論行動方略，分派專人與各地會黨、學堂、新軍部隊聯絡。*不幸九月間，長沙的行動被破，科學補習

④ 知之錄，頁六五，馮自由撰：「興國州人曹亞伯」；又黃克強先生年譜，頁七〇。

⑤ 歐陽瑞麟，「武昌科學補習所革命運動」。辛亥革命（一九五六，上海），冊一，頁五五三～四。至歐陽瑞麟、歐陽振聲、曹德銘、羅律中、汪育松、陳文深、胡勘臣、胡靜軒、廖鏡泉、曾松喬九位文普通學生援助宋教仁脫難事，見宋教仁，我之歷史（民五一，臺北，文星），頁五十四。

⑥ 知之錄，頁五六～七；我之歷史，頁二～十四。

所于廿日被查封，會員事先聞風逃逸，幸免于難。文普通的宋教仁、歐陽瑞麟二人，被開除學籍。余誠赴日留學，加入同盟會，劉靜安得曹亞伯之介紹，避入武昌聖公會任附設日知會閱報社司理。補習所至此星散，唯賴劉靜安一人，借教會之掩護秘密聯絡同志。一在十一月二十二日，王漢、胡瑛謀刺鐵良于河南彰德車站，不中，王漢因而投井自殺。^②

在此之後不久，東京同盟會成立，被遣及逃避海外的湖北學生，紛紛投入這個革命組織，並擔當重要角色。

(二) 湖北學生與中國同盟會之成立

湖北留學生是同盟會成立初期的主要骨幹。

如前所述，光緒三十一年春，孫中山在北京結納革命同志，加盟者二十餘人，其中湖北學生賀子才、胡秉柯、朱和中等十八人，為主要成員。同年六月二十八日，孫中山在東京召開同盟會籌備會，由於它是與華興會的聯合組織，故于十一省學生出席的七十三人中，以湖南的二十人為最多，湖北十八人次之。他們的名單如下：

湖北：時功玖、曹亞伯、田桐、但燾、蔣作賓、耿觀文、涂宗武、余仲勉、周斌、陶鳳集、葉鳳薰，李仲達（四光）、劉通、李叶乾、范熙績、許緯、劉樹湘、匡一。

湖南：陳天華、黃興、宋教仁、劉道一等。^③

同盟會于七月廿日（陽曆八月二十日）開成立大會時，各省學生加盟者增至約百餘人，其中以湖北二十七人為最多，廣東二十四人次之，湖南二十三人又次

* 宋教仁赴常德，曹亞伯赴長沙，呂大森與康建唐、何季達等，則利用暑假赴鄂西組織會黨，劉度成運動武高學生，劉敬安運動馬隊營，張難先運動工程營，其他學堂與軍營均有人負責聯絡。（見李廉方，辛亥武昌首義記，頁五）

② 知之錄，頁五五～五六；辛亥革命，冊一，頁五五三。

③ 關於同盟會開成立會時出席的人數，宋教仁「我之歷史」作七十餘人，而鄒魯「中國國民黨史稿」作數百人，今經蔣永敬考證，出席者百餘人，最高不超過二百人。蔣永敬，「從『中國同盟會成立初期之會員名冊』探討幾個問題，新知雜誌，第一年第四期（民六〇年八月，臺北），頁三一～四一。

之。⁵⁴

同盟會成立後，湖北人加盟者，據張難先的統計，海內外共一百六十一人，其中大部份為留學生。⁵⁵

在參加同盟會的兩湖學生中，已知由武昌文武學堂出身者，有三十六人，其中以兩湖書院的十八人為最多，文普通、武備學堂與陸軍中學次之。

兩湖書院：黃興、曹亞伯、胡錚、陳嘉會、胡秉柯、賀子才、李藩昌、王鴻猷、魏宸組、史青、程家樞、時功玖、但燦、劉成禹、戢翼翹、何成濬、張知本、胡鈞十八人。

自強學堂：馮一。

文普通中學：宋教仁、田桐、蔣作賓、時功璧、龔國煌五人。

農務學堂：戢翼翹⁵⁶。

武備學堂：朱和中、孫武、鈕永建、李四光四人。

將弁學堂：楊澤鴻。

武普通中學：石瑛。

陸軍中學：雷洪、蕭宏濟、侯英、曹宗珍、陳頊頑五人。

他們在同盟會中，多擔任重要的角色，如黃興為執行部部長，程家樞為外務科長，宋教仁為司法部檢事長，但燦、田桐為秘書科長，曹亞伯、吳崑等為評議員，時功玖、余誠先後為湖北分會代表，而黃興與宋教仁亦先後為湖南分會代表。⁵⁷

同盟會成立後，決定分遣同志返回本省，領導革命。湖北分會代表，首派者為時功玖，次派陳鎮藩，均因身份暴露未能返鄂。最後因知劉靜安已得聖公會會長胡蘭亭的同意改日知會為革命機關，乃改派前科學補習所會員余誠返鄂，依日知會行事。余誠于三十二年春抵鄂，同盟會之勢力，於是才真正進入湖北。

⁵⁴ 同上，頁三九。

⁵⁵ 知之錄，頁一〇五～六；一二一～一二四，「鄂籍會員名冊」。

⁵⁶ 湖北文獻編委會，湖北文獻，期二（民五六年一月，臺北），頁一九，戢翼翹，「先賢文襄公事蹟譜」。戢說他于光緒廿七年考入農務學堂，一年後轉入上海育才學校，後讀北洋大學工科，卅二年奉天官費留日。是同盟會會員。

⁵⁷ 知之錄，頁一一八，同盟會東京總部組織，總理外，設執行、評議、司法三部。

(三) 學界與日知會

日知會是湖北軍學界的第二個革命組織，在劉靜安積極活動了半年之後，于光緒三十二年正月成立。時東京同盟會派余誠返鄂，依日知會活動。劉、余原為科學補習所的同志，至此合作無間，會務蒸蒸日上。他們的方略，固以新軍為目標，但因滲透新軍比較困難，暫以運動學生為入手工夫。發動學生，必須透過教師與同學，因此，各校都指定專人負責，如兩湖總師範學堂為教習余德元與金華祝，武昌支郡師範為李長齡與李亞東。余德元(字明卿)，原係兩湖書院畢業，廿八年留日學師範，返鄂後就與李步青等人活動，在兩湖總師範教授教育學。金華祝(字封三)，亦兩湖書院畢業留日學師範，曾在「湖北學生界」上寫國內新聞。返國後，先受黃興之聘，在長沙明德學堂教書。卅年湖南起義事敗後，返武昌總師範教教育學。^⑧顯然由於他們二人的宣傳，所以總師範學生參加日知會的人很多。至於李長齡，亦曾在明德學堂教過數學。在武昌支郡師範學堂，則教國文。他公然在堂中向學生宣傳革命。旋入營當書記，牽引新軍多人加入日知會。^⑨李亞東為體操教官，亦向學生作同樣的宣傳。文普通的蔡達生，留日返鄂後，亦負責運動學界。他的「死法」是鄂生最愛讀的刊物之一。

此外，負責運動學界的還有下列七人。他們的學歷背景未詳。不過，依常理及科學補習所的先例看，他們很可能是各學堂的教習或學生。

劉通(字子通，黃岡人)，為東京同盟會籌備會參加者之一。

范騰霄(字銀槎，利川人)，留日返鄂學生，為日知會發起人之一，運動學界最力。後入伍當兵，運動新軍。

查光佛(字競生，蘄春人，後于羣治學社任商務報編輯，復入振武學社與共進會，辛亥後，任教育部副部長)。

張海濤(黃岡人)。

陳雨蒼(字少峯，荊門人。首義時為軍醫，後任都督府參議)。

^⑧ 知之錄，頁九一；金在明德教書事，見黃克強先生年譜，頁六八；返總師範教書事，係據葉蘭彬的回憶(未刊)。

^⑨ 知之錄，頁九五，「李君筱香傳」。

石志泉（字友儒，孝感人，民國後為司法部次長）。

馮羣先（黃岡人）。^⑩

他們運動學生的方法包括隨機宣傳，定期演講，散布革命書刊，與辦理學堂。日知會會所，每星期日均有演講會，分析時局，批評政府，宣傳革命，慷慨激昂。軍學界前來參加者，習以為常。經常負責主講的有金華祝、余德元、梁耀漢（留日返鄂生、同盟會會員）、李亞東、與馮一等人。光緒三十二年五月八日，同情革命之法國武官歐吉羅（Captain Ozel）抵日知會會所演講世界革命情勢與中國革命之需要時，聽講的軍學界青年就有數百人之多。^⑪ 可見情況之熱烈。

演講之外，是散發書刊，當時學生最愛偷看的是陳天華的「猛回头」與「警世鐘」，蔡達生的「死法」。「民報」亦已偷運進來。此外，梁耀漢註釋「孔孟心肝」一書，辯論種族關係，闡揚共和政體，「並印刷數萬部」，廣為宣傳。對新軍士兵，則于夜間或出勤時，由營中同志將宣傳書刊置于各士兵榻下，因此，士兵多有革命思想。^⑫

日知會的另一種活動，是辦學堂，培養同情革命的學生。前後辦了江漢公學與游學預備科等學堂。余誠、何自新、李亞東等均任教職。此外，由會員創設外圍組織，吸收同志，如梁耀漢設羣治社及明新公學，熊十力等設黃岡講習社，趙鵬飛等設安郡公益社等是。至于旅館、書報社、照相館亦不在少數，皆與日知會相呼應。^⑬

由于彼等之努力，軍學界入會的總共約百餘人，知名者一一八人（近萬人之說，顯係誇大）。幾乎各學堂都有學生參加，已知學籍者三十一人，而以總師範學堂為最多。他們的名單如下：

武備學堂：

吳祿貞（缺席會員），于光緒三十年春天，去北京練兵處任職，並在西北與東

⑩ 知之錄，自八九～九二，日知會「會員名錄」。

⑪ 武昌革命真史，前編，頁一三九。但據會後留影點數，約二百人，其中還有若干幼童。（見同書，頁一四〇背面）。

⑫ 知之錄，頁九四，周海珊撰「梁耀漢傳」；熊守暉編，辛亥武昌首義史編（臺北，臺灣，民六〇），冊一，頁一八五～六，陳春生，「武昌日知會破案詳記」。

⑬ 同上，頁一三九，「余誠傳」；李廉方，辛亥武昌首義記，頁六。

北活動。（宣統二年冬任第六鎮統制官，駐保定）。^⑭

藍天蔚，光緒廿八年返鄂後，可能先後在武高等、武師範、陸小、講武學堂等校充任教官。（辛亥年初，始調赴東三省任奉天第二混合協統領）。^⑮

孫武（字堯卿，夏口人），科學補習所會員，三十一年赴日學海軍，入同盟會，返鄂入日知會，助劉靜安辦江漢公學及黨務。日知會敗，逃遼陽依吳祿貞，轉赴日本（後為共進會要角，對新軍幹部有影響力）。^⑯

武高等學堂：劉度成（字熙卿，沔陽人），在科學補習所及日知會，均負責運動武高等學生。

將弁學堂：

季雨霖（字良軒，荊門人），可能于光緒二十七年入將弁學堂，畢業後任軍職，為三十一標三營隊官，宣傳革命，「官兵之景從者衆」。三十二年十一月後被捕入獄，迄翌年四月出獄，離鄂在外活動。

李亞東（名斌，河南信陽人），將弁學堂畢業後，任廿九標第一營左隊官，因革命嫌疑革職，後轉任工業傳習所及支郡師範體操教官，對學生鼓吹革命。入日知會後，星期日常在會所登臺演講，慷慨激昂。事發後，被捕入獄，在獄中仍舊從事革命活動。^⑰

陸軍（特別）小學堂：

熊十力（原名子貞，黃岡人），在會謀起兵，因被統制張彪下令逮捕而逃逸（首義後任都督府參議）。

趙鵬飛（字雄群，鍾祥人），創設安郡公益社，吸收同志（首義後任都督府顧問）。

兩湖總師範：

⑭ 革命人物誌，集二，頁二二五，中央黨史會，「吳祿貞」。

⑮ 湖北文獻，期九（民五七年十月十日），頁四六，劉道平，「震撼清廷和北洋的藍天蔚先烈」。

⑯ 知之錄，頁一八九，「孫武傳」。

⑰ 同上，頁一〇〇，「李亞東傳」。

金華祝，教員（如前），到處演說，宣傳革命，影響很大。

余德元，教員（如前），亦到處演說，宣傳革命，有很大影響。

李作棟，學生。

蔡大輔（字雪舫，京山人），學生，後入羣治學社與振武學社。

宛思演（黃梅人），後入羣治學社、振武學社與文學社。曾出資二千元，在漢口辦商務報（後改為大江報），以其黃州府中學同學詹大悲為主筆，批評鄂政，激發軍學界排滿革命情緒。^⑯

此外，註明為南師範者有：蕭石藩、袁銘助、李國芳、周進先、黃文凱、馮孝友、陳道章、羅定邦、葛郭屏、劉祖榮、劉治訓、舒仁敬十二人。他們于三十二年十月一起加入，且每人每月允捐錢一百至三百文不等。^⑰

兩湖書院：曹亞伯。

鐵路學堂（在東京）：殷盤（字云齋，黃岡人），學生。

文普通中學：時功璧。

自強學堂：馮一，與時功璧為至友，因時往文普通活動，為田桐所稱讚。任日知會評議員後，凡文告多出其手。每星期均在會所登臺演講，激奮羣衆。又辦楚報，縱論鄂省政治，為張之洞所忌，請英警緝捕。後赴上海暫避。^⑲

高等小學堂：

黃家麟（字篤前，漢川人），漢川高小畢業，因閱申報所載徐錫麟殺恩銘文，恨滿清專制，而入伍當兵。（後考入講武學堂畢業）^⑳

朱子箋，南路高小學生。^㉑

可以說，這是學界參加革命活動的高潮。學生加入日知會的實際人數，雖無直接的資料，不過，當日知會會所于三十二年十一月廿三日，因瀏陽、萍鄉起義牽連

⑯ 武昌革命真史，前編，頁一三七；知之錄，頁一四九。

⑰ 同上，頁三三~四。

⑲ 知之錄，頁七八，歐陽瑞麟，「馮特民傳」。

㉑ 同上，頁一七六，王贊承，「黃家麟事略」。

㉒ 武昌革命真史，前編，頁三四。

被圍時，當場「搜獲名冊四巨本，多係學界中人」。^⑯這是最好的旁證。

萍、醴起義後，日知會會員被捕的，有劉靜安、李亞東、季雨霖、梁耀漢、吳貢三、張難先、胡瑛、朱子龍與殷子衡九人。

當殷子衡于十二月十八日在黃岡被捕下船時，學生「蜂擁江干，望船痛哭，如羣羊之失牧人，哀號不已」。^⑰

殷子衡入獄後，于次年春患重病，方言學堂的學生李西林，精于醫道，聞其病，去獄中醫治，並典當衣服，為其買藥。他隔日去獄探病治療一次，前後凡七十餘日之久。^⑱這些事實說明了日知會對學界運動的廣泛與深入。

不過，日知會失敗後，學生的活動，因受張之洞控制，幾乎停頓。

四、張之洞的疏導、控制與鎮壓

張之洞是非常提倡教育的，但看到學生鬧學潮，幹革命以後，悲痛不已。他對付的辦法，不外軟硬兼施，即既注意到思想的說服與控制，亦注意到武力的鎮壓。不過，如果學生不參加實際的「叛逆」行動，他的態度還算是溫和的。如光緒廿四年，在武備、自強學生「集衆毀鬧」之後，他的辦法是一面裁減學生名額，淘汰問題學生，並加派「正途出身」的候補人員為漢文教習，增加漢文的教學時間。漢文教習的職責，「不獨講明經史，課作論說，尤必須約束諸生，率循規矩，時時切加訓廸，勉以修身之品，成材報國之道，令其忠愛廉恥之心，勃然奮發。」^⑲亦就是以漢文教習控制學生思想言行。光緒廿六年，對農務學堂的可疑秘密活動，亦採取同樣的方法。而對兩湖書院學生抗俄集會的態度尤其溫和，學生們的情緒被引導去學習邊疆地理，頗為成功。

庚子自立軍之役，對張之洞是一大打擊，因為唐才常與傅慈祥都是他的學生，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，只好將他們處決。但單賴捕殺不能解決所有問題，他于是在庚子九月，撰文勸戒上海國會及出洋學生，並要求鄂留學生監督錢恂，深入調查鄂

^⑯ 辛亥革命，冊二，頁四七四，陳春生，「丙午萍醴起義記」。

^⑰ 武昌革命真史，前編，頁一六四，「殷子衡之日記」。

^⑱ 同上，頁一七三。

^⑲ 張集，冊三，頁一八六二，「札委正途出身各員充武備自強學堂教習」，光緒廿四年十月十八日。

生，凡專心向學，不受康、梁影響的，給予獎勵與保護，對附和的，嚴予告誡與開導，對執迷不悟的，則商請各校當局開除。^⑦

庚子自立軍事件，同時亦迫使他對內採取鎮壓的措施。最顯明的例子是建立警察力量，加強偵探活動。張之洞于光緒廿八年，模仿日本的制度，在武昌設立警察總局，並派遣警務學生何萬福等十二人留日，學習警察。^⑧ 廿九年在閱馬廠設警察學堂，以去年留日的警察學生為教員。三十年又選派文武員弁四十七人赴日學警務。三十一年，在科學補習所被封之後，武昌警察學堂擴大招生四百人，迄三十三年時，已有三百零二人畢業，一律分派于武昌、漢口各警局工作。^⑨ 同時增強密探活動，偵破革命組織日知會。

另一方面，對革命刊物，採取查禁政策。光緒三十年十一月三日，于科學補習所被封之後，張氏正式通令各屬，查禁「警世鐘」、「猛回頭」等書刊。他的辦法有二：(一)令江漢關道照會稅務司，對入口書刊詳加檢查，如發現上述二書及其他宣傳刊物，一概檢送督署銷燬。同時查究販運者及著作人。(二)令各屬出示，禁止坊間及居民收藏、銷行或傳送上述刊物，違者治罪。^⑩

上述嚴密的防範措施，對武昌軍學界的革命活動，確是構成一種威脅。不過，壓制愈厲害，反壓制的力量亦愈大。武昌學界的革命活動在潛伏了一段時間之後，又因湖北共進會的成立，再度活躍。散佈在新軍中的文學社，亦因反抗瑞澂的高壓政策，而與共進會聯合起來。

五、學界與武昌首義

武昌首義是湖北共進會的傑作。湖北共進會是武昌軍學界的再生組織，學生們扮演重要的角色。

共進會是同盟會部份會員孫武、焦達峯、居正等人于光緒三十三年三月，設立于東京的組織。翌年九月孫武返鄂，十二月焦達峯亦返漢口。二人經過商議，于宣

⑦ 同上書，冊三，頁一八九〇，「勸戒上海國會及出洋學生文」，光緒廿六年九月十四日。

⑧ 房兆楹，「題名錄」，頁廿四。

⑨ 張仲忻等編，*湖北通志*（民十，上海商務，臺北華文影印本）冊三，頁一二五〇。

⑩ 張集，冊三，頁一九二八，「札北臬司通飭各屬查禁逆書」，光緒三十年十一月三日。

統元年三月，在漢口設立總機關。由於孫武等人的積極活動，終於將沈寂了一段時間的學界，與發展中的文學社聯合起來，而形成一個「內部組織已相當嚴密，且富有自動精神」的堅強團體。聯合工作相當困難，因共進會是由學生領導的組織，而文學社則為單純的士兵組織，二者間雖時有接觸，但仍舊互不信賴。聯合運動係由孫武主動促成，孫武認為過去的經驗證明軍官消極腐化，不足為謀；會黨思想不純，不能用命；唯有新軍士兵可以用命，應該爭取。^⑧ 聯合大會是于辛亥年八月三日在武昌召開的。會中公推孫武為主席，討論起義方略與日期，並決定于八月十五日（西曆十月六日）中秋節起事。這是辛亥武昌首義半月前的情形。

共進會是在與上海同盟會「中部總會」及香港「統籌部」聯絡不足，主要負責人之一的居正、宋教仁在上海未歸的情況下，發動起義的。^⑨

在已知名的共進會會員二百五十七人中，^⑩ 至少已知有武昌文武各學堂的學生三十五人參加，其中以兩湖總師範學堂與陸軍中學較多。文學堂學生多負責組織及行政的工作，而武學堂學生則擔負軍事指揮及戰鬪的責任。尤以測繪學生的貢獻，不可磨滅。他們的名單及任務如下：

武備學堂：孫武，光緒三十四年九月由日返鄂活動。于總機成立後，主持會務。主動聯合文學社，廣大革命基礎。曾售家產得銀千兩，支持會務。起義時，手頒臨時組織，擔任軍務部部長。因製炸彈不慎爆炸受傷，引發首義。

兩湖總師範學堂：

張振武（字春山，羅田人），在校受教師時象晉影響，而參加革命。留日學法政，起義時任理財部副部長。

蘇成章（字斐然，利川人），為義齋第二堂學生，起義前，任組織部秘書。起義後，任軍政府政事部長及教育部長。

⑧ 李白貞，「共進會從成立至武昌起義前夕的活動」（在熊守輝編，辛亥武昌首義史編，冊一，頁二七二～二八九）；湖北文獻，期廿一（民六十年十月十日），頁二三～二四，左舜生，「武昌革命成功的基本原因」。

⑨ 同上；又期廿二，頁廿一～廿一，居正，「辛亥割記」（四）。

⑩ 知之錄，頁一八〇～九。湖北共進會「會員名錄」。

周之瀚（字鵬程，宣恩人），為義齋第三堂學生，起義後任內務部副部長。

牟鴻勵（字猷宣，利川人），仁齋第一堂學生，為文學社共進會合併政治籌備員，與查光佛等奔走于二團體之間，促成合併。起義前任司勵，十八日，同彭楚藩、劉堯澂、楊宏勝三烈士被捕。後任總稽查員，及實業部副部長。

袁國紀（字漢南，恩施人）為義齋第一堂學生。

邢伯謙，是兩湖師範的代表，起義時任秘書。

李作棟（字春萱，沔陽人），起義時任理財部部長，起義後任財政部部長。

朱崎三。

方言學堂：

張育萬（巴東人），方言學堂第三屆畢業生（宣二年十一月），為該校代表，時二十四歲。

向炳（字明齋，恩施人），起義後任內務部參事，時二十五歲。

鐵路學堂：劉鄂生、牛廷臣、方旭明，均為學堂代表。

工藝（業）學堂：趙學魁（字師梅，巴東人），為學堂代表，主持同興學社，十九日被捕，起義後得釋。

文普通中學：宋教仁與向炳焜。

測繪學堂：

方興（原名繩修，長陽人），為學堂代表之一，起義時任敢死隊長。

李翊東（字西屏，黃國人），學生堂代表之一，後任敍賞長、參謀、參議等職。此外，尚有胡聯喬、閔燮卿、王繩武、李華模、宋珍珊與范義俠等人。

測繪學堂學生八十人，在方興等率領之下，于辛亥首義午夜，一起拿起武器，在城內響應革命，發揮決定性的作用。

陸軍中學堂：

耿丹（字仲釗，安陸人）、雷洪、王天佑、謝復、席正銘、張宗海均為學堂代表。張篤倫、王秉乾、張宗海等均為會員。此外，陸軍中學學生中，由雷洪、席正銘二人介紹加入共進會的人很多。甚至教官，亦都同情革命。于辛亥首義次晨，就由教官易正柏等四人及雷洪、席正銘二人，共同率領學生五百餘人，鳴號入城，逕

赴設于諮議局的軍政府，請求派給戰鬪任務。^④

陸軍（特別）小學堂：

李繼廣（泗陽人），陸小畢業，起義時任團長，在漢口陣亡。

蔡濟民（字幼香，黃陂人），陸小學兵、排長。參加日知會、羣治社與共進會。辛亥五月，同盟會鄂支部成立，被推為參議部部長。起義時，率步兵首攻總督衙門，後赴陽夏督戰。

吳醒漢（字厚齋，黃陂人），陸小畢業，三十二年入同盟會。辛亥首義時，攻督署，頭部受傷。後赴漢陽抵抗清軍，任總司令部作戰主任參謀及湖北軍務司長。

王鴻猷（與兩湖書院的王鴻猷同名，恩施人），畢業後任四十一標一營司務長。辛亥八月，駐防施南反正。

高建瓴（字醒吾，監利人），為陸小學堂代表，起義時任總司令部參謀，與方昉、王大禔等率領全體學生三百餘人，響應革命。^⑤

當然，學生參加共進會或響應起義的絕不止以上這些人，而辛亥革命之成功，亦不單是學生的力量。不過，他們確是擔任組織、策劃、宣傳、聯絡與指揮的工作。他們能主動地把握時機，舉起義旗，無疑有賴于他們長期鬪爭的經驗與革命救國的熱忱。

首義成功後，武昌學生自然擔任組織都督府，抵抗清軍，鞏固新政權與維護社會生活秩序的重要工作。如在鄂省都督府的最初四部組織中，孫武任軍務部正部長，因傷，由副部長張振武（總師範）代理，楊開甲（武備）任參謀部副部長，張知本為政務部副部長，蘇成章任教育部長，周之瀚任內務部副部長，李作棟任理財部長，向炯（方言）任內務部參事等是。^⑥

結論

綜合觀察武昌學界的革命活動，可得下列幾點印象。

④ 革命文獻，輯四，頁四二～三，「武昌首義」。

⑤ 同上，但知之錄，頁一八二，以高建瓴為陸中代表，恐誤。本文從革命文獻。

⑥ 知之錄，頁二七三，「都督府之組織及人選」。

武昌學界，自光緒廿三四年起，已呈現不安狀態。不滿與反抗的事件，時有所聞。不過，都是個別的，尚未構成威脅。自廿六年起，因不斷受到外來的，尤其是留日返鄂學生的影響，而逐漸形成革命團體，並進而採取行動。

武昌革命運動發展的方向，是由學界而新軍。在組織模式上，除了風聲緊急的時期以外，他們都採取軍學界聯合的方式。可以說在革命醞釀階段，是以兩湖書院、文高、武備學堂為主的聯合活動。科學補習所，是以文普通與武備學堂為主體的革命組織。日知會是以武備與師範學堂為主的組織，而共進會則是以陸軍中學、測繪學堂與總師師範為主的聯合組織。由於採取了這種正確的革命運動方法，使他們輕易地利用了張之洞的「文武合一」教育政策，滲透到文武學堂與新軍之中，宣傳革命思想，爭取更多學生與新軍的支持。

至于武昌革命組織的規模，從科學補習所到共進會，前後有大小革命團體三十一個。如前所說，自日知會被封後，多潛入新軍之中，迄共進會才恢復軍學界的聯合方式。估計前後參加武昌革命組織或革命活動的學生至少一千人。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。在各學堂中，兩湖書院與文高學生有黃興等三十餘人；武備學堂有吳祿貞、朱和中、藍天蔚等九人；文普通中學有宋教仁等四十餘人；師範學堂有張振武等廿餘人；陸軍中學有席正銘等五百餘人；測繪學堂有方興等八十人；陸軍小學有熊十力等三百多人。此外，將弁、農務、自強、工藝、武高等學堂均有學生參加，不過人數不多。至于存古學堂，則由於年齡與思想的關係，沒有一人參加。

這些革命組織，有相當大的持續性與堅韌性，而各組織之間，亦有相當的聯繫，如一人同屬於數個團體成員。由於有這種堅韌與聯屬性，故最後為共進會所統一。

湖北當局張之洞、端方、梁鼎芬等人的鎮壓、驅逐與遣送出國的政策，確是發揮阻止革命蔓延的作用。但是許多領導份子，如唐才常、傅慈祥等所表現之壯烈犧牲精神，黃興、宋教仁、曹亞伯等人所表現的堅強意志，與臨危不懼的勇敢行為，以及同志間的精誠合作，肝膽相照，使革命元氣得以保持不斷。如光緒卅年湖南華興起義失敗後，曹亞伯之幫助黃興脫險，通知宋教仁避難；文普通學生歐陽瑞麟等十人之熱情幫助，使宋教仁得在武昌滿城風雨之際，能够進出自如。臨行前，羅律

中還送到江邊，汪育松、歐陽振聲二人則親送到漢口，代購赴上海船票後始返。^⑦日知會失敗後，方言學生李西林之典當衣服，赴獄探治殷子衡的疾病。這種表現珍貴革命感情的例子，不勝枚舉，與革命運動之持續和成功，確有很大的關係。

張之洞是「中體西用」的鼓吹者，其主要目的在確保學者政治上的忠順，而其結果，則不盡理想。從上述武昌學界的革命運動中，可以得到證明。尤以兩湖書院及武備學堂的學生為甚。我們知道，兩湖書院的目標在培養「出為名臣，處為名士」的人才；而武備學堂，則在培養保衛政府的將才。而領頭推翻滿清者，亦以此二校學生為最激烈。這是張之洞所無法了解的。

總之，從中國社會近代化的觀點看，張之洞在湖北的教育建設，對湖北的文化與社會而言，確有很大的貢獻。但從革命黨人的立場看，他的這一切努力，不異在為滿清政府準備滅亡的條件。張知本說他「擬扶清室起衰運，却為新邦建始基。」^⑧我想這是最好的定論。

⑦ 朱教仁，我之歷史，頁五～一四。

宋于光緒卅年九月廿二日離家，廿八日到武昌，在街上遇曹亞伯。曹帶之到聖公會，告以情況危急，已有二人被殺。是晚宿于船上。廿九日復入城到寧鄉中學晤曹亞伯，曹促其速行。但宋赴高等學堂訪戴臻章，借二圓，辭去，又遇曹于途。曹又帶他到聖公會，告他已在黑名單中，給十五元，促速走，因返長沙。十月十日，為慈禧壽誕，武昌張燈結彩，戒備森嚴，朱教仁于早晨進入武昌，住在督署右後側的文昌門慶云棧，通知文普通同學曾松喬來談，曾生轉告陳文生、曹德銘、歐陽振聲（俊民）、羅律中、汪育松、胡助臣、胡靜軒、廖鏡泉、歐陽瑞麟（季香）等，相續來棧晤談，並集金贈宋，促其速走。宋于十月十一日晚八時始登舟赴漢口。

⑧ 張知本「武昌首義成功之因素」，中華雜誌卷一期三，頁七。